



重讀《台灣連翹》

● 盧彥光*

吳濁流（1900 – 1976）的作品《台灣連翹》，我在年輕的時候曾經拜讀過。不過當時年紀輕見識不廣，加上是為了查閱資料而閱讀，不能算是真的讀過，只能說是翻閱而已。然而我卻一直惦記著這本書，我想一本書可以讓人看過還想再細細品味，那是真的值得流傳的書。

現在，再次重拾此書只想要好好的閱讀，別無目的反而越看越有興致。感性的閱讀融入作者所在的時空，很開心地進入與自己相距遙遠的歲月，隨著作者對日常生活的仔細敘述，我好像也多了一雙穿越時空的眼睛。

《台灣連翹》是吳濁流自傳式的遺作，原本以日文寫成。作者從 1971 年 9 月開始動筆，當時已高齡七十一歲，耗時三個多年頭，於 1974 年 12 月 29 日完成。是什麼樣的使命感，讓他在老耄之年仍然執意埋首桌前，對抗歲月頑強揮筆呢？重述當年，卻遺言此書死後十年始能發表，如此戒慎。想留給後人的是存在心中不能遺忘的時光吧！

吳濁流出生的 1900 年，正是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之後的五年，感覺那是一個遙遠的歷史年代。然而，對照身邊長者出生的年代，便不覺得遙遠且陌生。我的祖父出生在 1912 年，祖父的大姊跟吳濁流年紀差不多，《台灣連翹》說的是那一代的往事。感謝這本書的出版，讓我可以深入祖父與姑婆他們的年代，體會他們的情感世

* 盧彥光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



界。

《台灣連翹》的時間軸設定，從吳濁流出生的 1900 年，到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為主；然而也零星旁及 1949 年之後的一些事件，譬如在 1957 年發生的美國大使館佔領暴動事件、1960 年發生的雷震案等。時間軸的設定，貫穿日治時代而止於光復初期，主要是作者認為 1949 年之後的事情，較為人知，便不多費筆墨。的確書中記錄光復之後的這個部分，時空背景比較接近當代，感覺較為熟悉，不是我特別專注的部分；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日治時代的部分。

書中紀錄的不只是顛簸曲折的台灣歷史軌跡，也記錄了舊時代人們的生活情調，風土民情等。我喜歡看日治時代的描述，吳濁流記錄了許多那個時代活生生的人物，讓讀者就像看了一場那個時代的人生電影。我特別喜歡看的是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往來，以及男女之間含蓄似有若無的情懷。

《台灣連翹》裡敘述到的人物眾多，包括不同角色的日本人與台灣人。在吳濁流的作品中，感覺日治時代的歲月流動緩慢，在看似樸實平靜的生活中，不乏熱血澎湃滾動的台灣人。斷代的轉變異族的統治，台灣人為了應付眼前的日常，對於日本人的蠻橫、監控與不平等的對待，在行為上與內心情感上多有分離。日本警務人員令人戰慄，台籍警務人員的險惡亦不多讓，吳濁流在書中便紀錄了一位曾經與他肝膽相照傾心而談，並以青年的純真相約上進的本島人警察鍾日光，在日本警察的體制裡終究還是變成險惡之徒。

同在台灣島上生活，日本人與台灣人卻像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，壁壘分明。當然也有一些比較例外的人物，譬如吳濁流敘述到一位同事一綽號「天智天皇」的日本怪人，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往來；台北師範事件，學生因為靠左走的問題和警察發生衝突，當時同情台灣人立場的太田校長，也是一位令台灣人尊敬的人物。另外，他也特別敘述到一位「二世日本人」。

那是吳濁流在五湖公學校任教時的事，當時有一位新進的女同事，她是出生在台灣的「二世日本人」。她和當時的日籍校長之間幾乎沒有往來，相反的跟台籍教員之間相處熱絡…。她剛從女學校畢業是一位「文學少女」，只要一有空就捧著小說閱讀，幾乎每個夜晚都會到吳濁流家裡來，她熱中於文學方面的討論。同事羅君認為她是很理





想的對象，因此為自己的同學介紹，並提出婚事。當婚事就要進入順利完成的階段，她突然被郡督學召見，加以嚴厲斥責並調離五湖公學校。她被調往新竹海岸附近的舊港公學校，後來在那裏和日本憲兵結婚了。看來在那個時代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，還是存在著難以跨越的藩籬。

在《台灣連翹》裡，還可以看到台灣人抗日思想的蔓延。吳濁流在公學校畢業之後，通過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的考試，在國語學校就學的四年間，校內便可以看到熱血澎湃的抗日種苗。當時學校發生過侮辱台灣學生的「清國奴」事件，校方處置不公，不少學生群起反抗也因而被退學；另外，校內還曾經發生破曉時分的怪火事件，原因不明，平常被校方看不順眼的學生便成了代罪羔羊，又是好幾名學生被退學；另外，不可思議的是學長劉邦漢的事件，在僅剩一個月即將畢業時，因為種植畢業紀念樹時跟農業助手頂嘴，就被勒令退學；同學藍某在點名時發出「唔，唔」的聲音，惹惱教師被罵「馬鹿野郎！滾出去！」，藍某不甘示弱地回嘴，立刻抱著書挺著胸膛走出去，不說也知道會被勒令退學。在這些事件中，反抗日本人無理蠻橫而被退學的學生，後來大部分成了抗日份子。

抗日的種苗在台灣燃燒，憧憬著祖國的心情，讓他們踏上大陸。當時這些有志青年，在大陸卻面臨著裡外不是人的窘境——在中國台灣人被視為日本間諜，不被信任。吳濁流自己也曾經憧憬著祖國廣闊無際的土地、自由的氣息，而遠赴大陸南京。他提到台灣人往往會說自己是福建人或廣東人，不願表明真正的身分，只在台灣人之間用「番薯仔」作為隱語。當時在中國的台灣人，除了有著一腔熱血的有志之士之外，還有為了其他不同目的前往的台灣人，在中國他們有著不同的經歷。前往中國的台灣人有的失望而回，吳濁流便是其中之一。在南京一年三個月的時光中，吳濁流從事記者工作到處奔波鑽頭覓縫，見多識廣卻深感個人力量的微弱，對於自己當初遠赴大陸的目的日漸動搖；就別說救天下國家了，他感覺自己連生命都可能保不住了，因而有不如歸去之感，寧願選擇回到台灣成為一隻失去自由的鰲一般地活著過日子。日治時代的台灣人被命運撥弄，真是左右為難相當無奈！然而，也有台灣人在中國混得風風火火，甚至成為中國高官，卻忌諱跟台灣友人見面，害怕自己台灣人的身分暴露，後來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後，又混入「接收台灣」的集團回到台灣，也就是人家



口中的「半山」。斷代的轉換，情感的認同，對於台灣人真是一個不容易的課題。

